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三月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　　编

[redacted]德昌　方兆麟

执行编辑

张玉芳　孙家骥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印张 1插页 171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1-00223-2/K·42

定　　价：　2.95元

China

目　录

我在光华书局时与鲁迅的交往 ……沈　涛（1）
三十年代我和郭沫若的交往 ……沈　涛（8）
记天津革命诗人黄白莹 ……肖义芳（18）
抗战前天津文艺界杂忆 ……吴云心（27）
回忆天津知识书店 ……叶笃庄（45）
知识书店往事回忆 ……杨大辛（53）

1944年赴大理考察记 ……郑天挺（64）

回忆在国民党空军的战斗历程 ……高文庆（99）
印度兰姆伽美军训练中心概况 ……王伯璘（123）
我在卡拉奇的受训生活……梁　深（131）
我驾机起义的前前后后 ……岳哲安（138）

天津的城市公共交通的演变……朱建斌（147）
天津市道路发展小史 ……张雅亭（160）

天津木商业概况……施子厚(175)
天津的木商业琐谈 ……张云华（192）

China

我所知道的天津几家木商号 ……杜聚华(199)
德和木号的兴衰史 ……王植如(205)

满族官宦人家的旧礼俗 ……张寿崇(214)
解放前天津吃红白饭的 ……杨绍周(234)

小资料
天津《商报》 ……吴微晒 (44)
解放前天津连环画市场的演变 ……王克明 (63)
天津海风社 ……郭武群 (98)
我与天津勤华墨水厂 ……赵云亭(198)
解放前的天津化妆品业 ……王子民(213)

我在光华书局时与鲁迅的交往

沈　涛

(一)

鲁迅先生的大名，早在中学读书时，我就在《新青年》杂志上见到过，但真正对鲁迅先生有了较深的了解，应该说是我在上海光华书局工作的几年间。

1925年我和张静庐先生在上海合办光华书局，以出版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人的著作为主。鲁迅先生的著作多由北京的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北新书局自京迁沪，鲁迅先生的著作仍交由他们出版。不久，鲁迅先生亦来到了上海。

1927年，大革命受到挫折，但在一部分思想进步的文学青年中，却响亮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当然其中难免鱼目混珠。鲁迅先生对于一些安全地住在租界内的亭子间里只是在文字上搞“革命文学”的青年，不以为然，曾多次著文加以批评，这激怒了一些青年作家，其中叶灵凤便是一个。叶灵凤曾是创造社的成员，为光华书局主编过《幻洲》半月刊，光华为他出版过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我和叶灵凤有较密切的交往，在受到鲁迅先生的嘲讽后，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最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篇中的主人公上厕所忘了带手纸，把口袋里的一本《呐喊》撕了几页当手纸用了。”他自以为这是对鲁迅的报复，其实正暴露了他自己的轻薄无聊。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29年时，经好友冯雪峰介绍，我和鲁迅先生已有所联系。一天，雪峰对我说，鲁迅先生想主编一个文艺刊物，专门刊登一些青年作家有进步思想的作品，同时介绍一些外国进步的文艺理论。出版这样的刊物有双重危险，一是恐怕销路不好，有亏本的可能；二是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摧残。所以，雪峰问我光华书局能不能出这个刊物？因这时张静庐先生已退出光华，书店由我一人主持，我自己便可决定出版方向。我毅然向雪峰表示，愿意出版这个刊物，并马上开始筹备起来。刊物定名为《萌芽月刊》，由鲁迅先生亲自勾勒“萌芽月刊”四个字，制成锌版，作封面。同时进行征稿、集稿、审稿和编排工作，这一切鲁迅先生都一一过问。雪峰协助鲁迅与书店之间奔走联系，并负责信件、稿件、校样的传递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至1929年底，《萌芽月刊》创刊号终于问世了。

至此，我与鲁迅先生尚未会过面，因为一切联系的事务都由雪峰从中操办。例如，刊物中需要一张木刻插图，鲁迅先生就从他自己珍藏的一本《德国版画集》中选了一张，由雪峰把画集转交给我，要我制成锌版作插图，并再三叮嘱，要小心，别把它弄脏，在制版后将书及时送还。

我和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30年的3月初，那时《萌芽》已出了两期。为了交流对该刊物的意见和对其前景的看法，当然也是为了联络大家的感情，3月6日晚，我在万云楼设宴请到了鲁迅先生和一些为《萌芽》撰稿的作家，包括冯雪峰、姚蓬子、韩侍桁、魏金枝、柔石、戴望舒、周颂棣等。宾主之间除了一些通常的客套话之外，大家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萌芽》这个新生的刊物上，此外还谈到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情况。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宾主之间频频举杯劝饮，可说是尽兴而

China

散。

同年4月6日下午两点，鲁迅先生为《萌芽月刊》的编辑事宜，在上海四川北路横滨桥北堍一家咖啡店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雪峰来邀我去参加。我便有幸再次见到了鲁迅先生。先生身穿一件浅灰色大褂，那深思的神态，就象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样，鲁迅先生高兴地同我握手问好。出席座谈会的有雪峰、魏金枝、柔石、侍桁、蓬子等八九个人，除了鲁迅先生以外，其余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座谈会上大家谈了读者对《萌芽月刊》的意见和文艺界的反映。我在发言中希望月刊上刊登的翻译稿文字最好再通俗些，以便于读者的理解，同时也谈到了印刷和发行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最后，鲁迅先生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月刊上所刊作品思想内容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努力方向，具体的措词我记不清了。当时的印象是，鲁迅先生是在引导着一批青年作家向进步的思想领域进军，期望刚刚出土的萌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座谈会开到下午四点方散。

《萌芽》出到第四期便开始遭到厄运，——杭州邮局的检查员查扣和截留了鲁迅先生寄出的《萌芽》，这仅仅是开始。待《萌芽》第五期出版后，就被国民党政府全面禁止发行了，书店交由邮局寄发各地书店和读者的《萌芽》均被政府派驻邮局的检查员查扣没收。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商量将刊名改作《新地》继续出刊，但很快又被查禁了。至此，《萌芽月刊》不得不宣告停刊。

在出版《萌芽月刊》这段时间里，光华书局还出版了鲁迅先生和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介绍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这套丛书，计划出十几本，在光华书局出版的有：《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鲁迅译）、《艺术与文学》（普列

China

汉诺夫著，雪峰译）、《文艺论集》（马克思著，成文英译）、《普列汉诺夫论》（雅各武莱夫著，宪章译）、《文艺批评论》（列什涅夫著，沈端先译）、《艺术与革命》（乌略诺夫著，冯乃超译）、《社会的作家论》（伏洛夫斯基著，画室译）等，光华出版的这套丛书，封面大部分用鲜亮的红字印刷，非常引人注目，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查禁。

这时，鲁迅先生打算出版一个战斗性的文艺旬刊，作为“左联”的刊物，先生自己欲捐助一百元大洋，作为该刊物的经费，雪峰找到我，问我：“光华书局敢不敢出版这个刊物？”我说：“敢！”事情就算定了，鲁迅先生也就无需捐款了。这是一张四开小报式的刊物，由李一氓同志主编。刊物取名为《巴尔底山》，是英文PARTISAN的译音，原意是游击队员。取此名的用意是想逃过国民党政府派驻邮局检查员的眼睛。据雪峰讲当初为这个刊物取名时，曾提出过好几个名字，最后采用了鲁迅先生提出的“巴尔底山”。但是，这个刊物的寿命也不长，只出了四期，即被扼杀。

(二)

光华书局在出版鲁迅先生主编的《萌芽月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出版了先生主编的《艺苑朝华》第五辑及《新俄画选》和先生作序的林克多著的《苏联闻见录》。

先生自费出版过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由于当局禁售，尚有部分书未售出，许多书店都不敢代售，鲁迅先生便将其以照原价五折的价格交由光华书局包销。

光华书局与鲁迅先生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我与先生的关

China

系，是从1929年下半年起，至1933年止，虽说只有短短的几年，但却是重要的几年。

在这几年中，鲁迅先生介绍了苏联的文学作品、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世界著名版画家的木刻。他主编的《萌芽月刊》团结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如浙江青年柔石曾写过一篇《为奴隶的母亲》。到1931年他不幸被国民党杀害，同时罹难的还有胡也频等，鲁迅先生的《无题》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便是为此而作。

（三）

由于《萌芽月刊》、《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以及《巴尔底山》等，都是在我主持下出版的，我自然也就成了被国民党注意的对象。1930年8月，我在朋友的劝告下，决定东渡日本，暂时避避风头。临行前，我和雪峰说，想请鲁迅先生题几个字作纪念，随后我便去了日本。“九一八”事变后我回国，到1932年4月初，雪峰给我送来了鲁迅先生题赠给我的一首诗：

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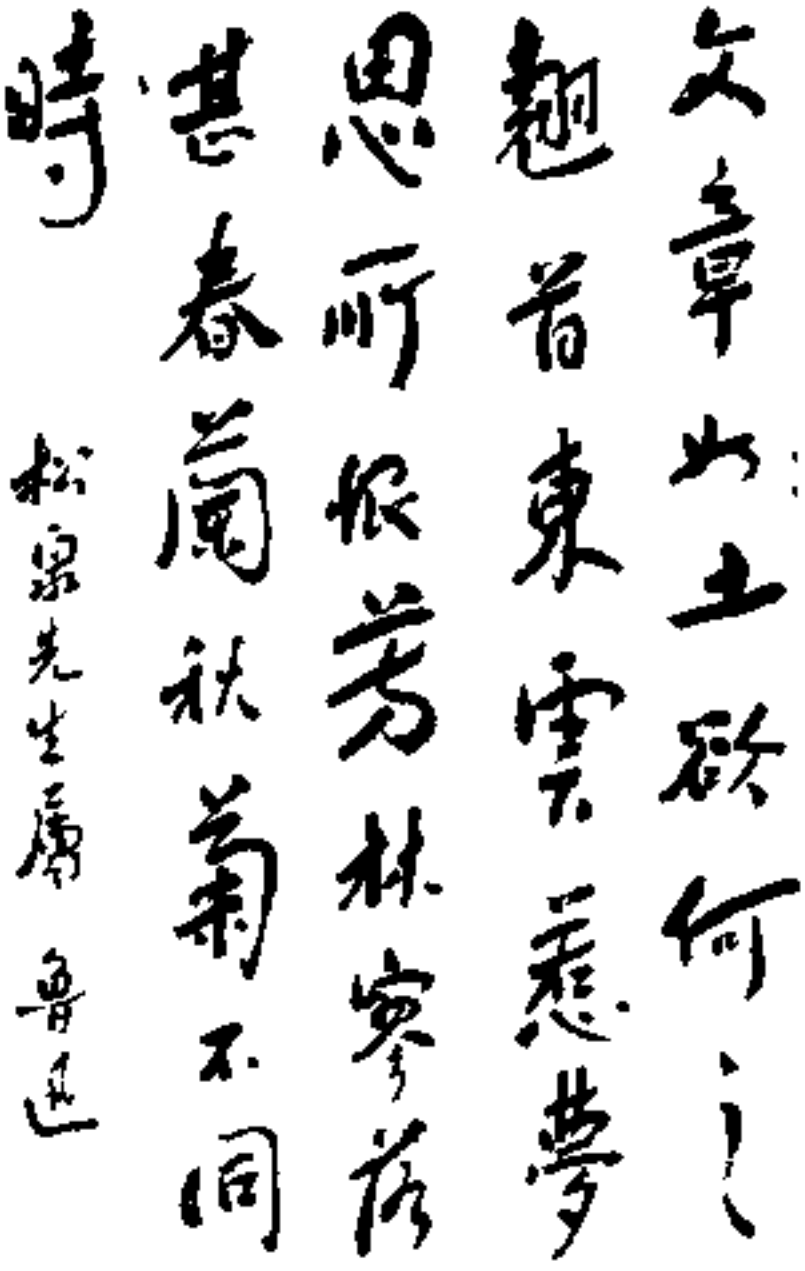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松泉先生属　　鲁迅

我高兴地接过鲁迅先生的题字，当即送到裱画店去装裱成一幅单条。先生这首诗，我的理解是借我的日本之行，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这幅题诗，我一直珍藏着，连同所收藏的任伯年、吴昌硕的画，赵之谦、李生翁的字，都放在一只特制的画箱里，随家携带。

抗战爆发后，我辗转各地参加抗敌游击活动，书画箱被妻子委托我的好友唐性天代为保管。抗战胜利后我才和唐先生联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章如土欲何之
翹首東雲惹夢
思所恨芳林寥落
甚春蘭秋菊不同
時

松泉先生屬 魯迅

系上，他非常抱歉地告诉我，由于战乱，他又将书画箱转托他舅舅代管，由于生活所迫，他舅舅将书画变卖殆尽。我心痛万分，可又无可奈何，完了！

1947年深秋，一天傍晚，我去作家书屋看望冯雪峰，恰好鲁迅夫人许广平及韩侍桁也都在那儿。许广平正在和姚蓬子商量《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吃饭的时间到了，蓬子邀我们到一家小酒楼吃饭，席间，我谈了那幅诗轴的丢失经过，大家都非常惋惜，第二天大家聚餐时我又说起鲁迅先生的题诗，许广平说："鲁迅先生很少给人题字，那一天他为你和周颂棣、姚蓬子三个人题了三幅字，是出于他一时的高兴，这是很难得

China

的。”

这年12月，我有事去武汉，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到汉口找到唐性天先生，问了他舅舅的住址。在棚户区我见了面容憔悴的老人，他一再表示歉意，我还能责备他什么呢？谈话中，他说到有几幅有上款的字画还没卖。在一只破筐子里，翻到了鲁迅先生的那幅题字，因题诗上有“松泉先生属”，才免于失落。我真是大喜过望，重重地酬谢了老人一笔钱，随即到照相馆把这幅题诗拍了下来。

鲁迅先生的题诗失而复得，听起来象个传奇。假如1947年12月我不去武汉，或者去了而没有找唐先生的亲戚寻根究底，恐怕这幅题字早已被人当作破烂，扔进垃圾箱了，而人们也就永远无法见到鲁迅先生的这一珍贵手迹了！当然我不能把它视为个人的珍宝，大约在1951年，我嘱我的女婿去北京时把鲁迅先生的题诗交给冯雪峰，并附一信，略述其失而复得的经过，请他将题诗赠给鲁迅纪念馆珍藏。

上述所提到的一鳞半爪的往事，只限于我个人在光华书局时与鲁迅先生的一段交往，但可以看出，在白色恐怖异常猖獗的时代，鲁迅先生为提倡无产阶级文艺，向黑暗势力的斗争精神。我已年届耄耋，看到今天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真有说不尽的感慨。

China

三十年代我和郭沫若的交往

沈　涛

(一)

郭沫若于1921年春和成仿吾自日本回国，住在上海马霍路德福里泰东图书局编辑部里。那时我正在该编辑部里当一名助理编辑，同住一起，同桌吃大锅饭，因此得与认识。在此之前，他在国内报刊上已曾发表过一些诗作和有关文艺的论著，所以他在“五四”以后的文艺界已小有名气。

先是，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与李凤亭商量要扩大泰东编辑部，计划设法学、哲学、文学三部，由李凤亭任法学部主任，邀请李石岑任哲学部主任，文学部主任一职，李凤亭推荐成仿吾担任。在这个计划商定之后，李凤亭就写信到日本去告诉成仿吾，成仿吾又转约郭沫若一同回国。这样辗转邀约，待到成、郭二人回到上海，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经理赵南公无法筹集扩充的资金，泰东扩大编辑部的计划已成泡影，李凤亭本人也到安庆法政大学任教去了，于是成、郭二人只好暂时在编辑部住下。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十分接近。那时候我是一个虚岁十八岁的小青年，世故人情都还不甚懂得。郭沫若大概不过三十岁，他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尚未毕业。他虽然学的是医科，爱好的却是文艺。他住进泰东编辑部后，经理赵

China

南公觉得既然把成、郭二位请来了，就委屈他们在编辑部里担任编辑。由于赵南公本没有预定的编辑出版计划，所以今后出什么书，编什么刊物，便由成、郭二人自己决定。这就给成、郭二人提供了一个出版的阵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意志。因此，在泰东的物质条件虽然很差，他们也乐于接受了。于是组成了创造社，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社这个文学团体的名字，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放出了光芒。

在我和郭同住在泰东编辑部的这一段时间里，我曾陪他去南京路当时上海唯一的一家外商开的专卖外文书籍的书店“别发洋行”买书。他买了一本《儿童心理学》。还曾陪他去外滩大东电报局，给他在福冈的妻子发电报。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从马霍路漫步走到“大世界”去乘凉，并欣赏晚香玉演唱的梨花大鼓。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静安寺路夏令配克影院看一部名《生命之流》的电影，是默片，当放映时，影院里的七人组成的乐队奏起了旋律动听的乐曲。这是一部富有哲理和诗意的片子，影片具体的故事情节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概的意思是一个人的生命象一条涓涓的溪流一样，中间虽然会涌入大江长河，但最终还是要汇入大海。以大海喻上帝，指生命的最终归宿，终究要回到上帝那里。就影片的主题讲，这是一部宗教片；就它编排的故事和摄制的技巧讲，这又是一部艺术片。看完电影后，我们大家回到编辑所议论，郭说：“这胜过我们到大教堂去聆听一位著名牧师的布道讲演。”

那时在泰东图书局工作的职工，无论在营业部还是在编辑部，待遇都很低。营业部有几位店员就谋做“小货”赚些钱来补贴。所谓“小货”，就是撇开书店，自己凑些钱，出版几本可望畅销的书，从中得些利益，我曾和郭沫若谈起此事，郭应允为

China

我译一本安徒生的童话《无画的画帖》，译成后交我出版，但我没有等他译完，便于1922年底脱离泰东，随张静庐到香港去了。

(二)

我于1923年底自新加坡回到上海，重新进泰东编辑部工作。此时郭沫若已去过日本，把他的日籍妻子安娜夫人和两个孩子都接到上海来了，住在哈同路民厚东里。那是一栋简陋的里弄房子，二层楼，没有院子，进门就是一间堂屋，会客、吃饭、写作都在这里。卧房在楼上。后面是一间厨房，没有卫生设备。自来水在里弄内，好几家共用。我常到郭家去，有时看见安娜夫人蹲在里弄里公用的自来水管底下和邻居的妇女们一起洗衣服。有一次我和郭在他的堂屋里谈一件什么事，门外忽然走进一个陌生的人来，问："郭沫若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来人清瘦，戴眼镜，穿长衫，问讯时有礼貌地摘下头上的帽子拿在手里。郭招呼他坐下，请问尊姓时，这人自报说："我是胡适。"于是彼此互相道了一些"久仰"等客套的话。两人的谈话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我一直坐在旁边，胡适看我好象是郭的学生，所以仅和我点点头。这是胡适主动上门初次拜访郭沫若的情况，时间大约在1924年初夏。

这一年夏季的另一天，我因我父亲患关节炎，两腿时常抽搐疼痛，我到哈同路民厚里去找郭，向郭谈起父亲的病状，郭欣然应允去诊断。他带了一个听诊器，我们俩一同乘电车去到我家。他用听诊器听了一下我父亲的心脏，用手指骨扣打了几下我父亲的腿关节，并问了问起病的时间和症状，服用了些什

China

么药，看过病后，他只说了些应当注意的话，并没有开处方。郭沫若为我父亲看病，这在他的一生中，作为一个日本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恐怕是第一次拿了听诊器出诊。从我家出来后，我还和他一起到南京路中华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两人并肩站立。郭沫若穿的是一件夏布大褂。这是一帧弥可宝贵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在抗战中我几次迁徙，都没有丢失。可惜在十年动乱后我平反回家时，遍处寻找，连同其他一些可纪念的文物怎么也找不着了！

不久，郭沫若一家从哈同路民厚里迁居到环龙路（今南昌路），我常去看他。这时他和泰东图书局的关系已经若即若离。有一次我去看他时，他给我看一封萧楚女写给他的长信，信开头说了几句推崇郭的客套话以后，接着就分析当前的中国形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军阀的专横和暴戾、劳苦人民的生活穷困、以及土豪劣绅的鱼肉人民、买办阶级和大老板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有觉悟的中国有志之士必须奋发起来改变这种现状，最后力劝郭应从文艺的殿堂中走出来看一看现实的世界。这封信厚厚的，有五六页，字写得很小，估计有一两千字。郭等我看完信后，对我说："这位萧楚女先生我并不认识，他信里的话说得是对的。我们该睁眼看一看现实的世界。"在这以前，创造社一开始就谈创造，谈文艺至上，同谈"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是对立的。我个人认为郭先生此后思想的转变，乃至直接参加革命的行列，萧楚女给他的这封信，多少有一点影响。当他亲眼看到了南京路上英国巡捕对中国工人的屠杀（"五卅"惨案），更加激起了诗人决心投笔从戎的革命热情。

China

(三)

1925年秋，我与友人张静庐合作创办光华书局，计划出版新文艺书籍。我去上海学艺大学找郭沫若，请他支援稿件。学艺大学是中国留日同学创办的一所大学，当时郭在该校任教。我见到郭向他说明来意，他一口答应，并说他近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好多篇有关文艺的论著，“你帮我搜集搜集，汇总起来，不下十几万字，可以出一本《文艺论集》。还有我发表过三篇剧本，写的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如聂荌、卓文君等，她们都具有鲜明的背叛旧礼教观念的性格，汇总起来，也可以出一本剧本集，不妨定名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你帮我从发表这些著作的报刊上搜集拢来交给我整理一下，便可以出版了。”由于他的热情支援，光华书局一开门就出版了他的《文艺论集》和《三个叛逆的女性》，以及由周全平编辑、创造社同人供稿的一本期刊《洪水半月刊》，随后又出版了郭沫若的《文艺论集续集》。光华书局也就在新出版业中站定了脚跟。

(四)

不久，郭沫若到广州去参加北伐，随国民革命军推进，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邓演达）。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接着东进，又攻克了江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邓演达留守武汉，郭沫若率部分工作人员随军推进至南昌，我遂于1927年1月偕同友人张静庐自沪搭长江轮溯

China

江西上，到九江后换乘南浔路火车到南昌。在南昌，我到总政治部去拜访郭沫若，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他接见了我。他全副戎装，高统皮靴，三角皮带，英姿勃勃，与过去在上海时身穿大褂、不修边幅的那种书生模样完全不同。那时正是寒冬腊月，我身上穿的是一件老羊皮袍子，看到郭的那种戎装的神采，真有些自惭形秽了。在郭的身旁，还坐着一位同样戎装的英俊少年，郭向我介绍："这位是李一氓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一氓同志。我们交谈了片刻，郭问起上海出版界的最近情况，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讲了一下。我又提到北京大学的教授张竞生在提倡青年人写性史，上海某书店出售《性史》，被租界法院罚款。郭说："《性史》一类的书毒害青年，应当禁止。"郭又问我："此次来南昌，有何打算？"我说："我和张静庐同来，想在南昌开设光华分店。"他说："南昌人民没有机会买到新书。开设一新书店，很有必要。"他的这种表示赞成的语气，使我得到了鼓舞。回到旅社，遂和张静庐积极筹划开设光华书局南昌分店的事。

1月21日，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总政治部在百花洲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我和张静庐也去参加并站在前列。郭沫若站在主席台上讲话，讲列宁从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经过和对当前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参加大会的群众多半是新组织起来的南昌工人、农民和市民，人数倒不少。由于场上没有扩音设备，他们是否真能听懂和听清带有四川口音的郭的讲话，是一个问号。

1927年4月北伐军攻克上海后，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血腥镇压上海的工人阶级和清除共产党。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和真面目。8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